



哪有斩不掉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豺虎？
哪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邓中夏

革命烈士卷

邓中夏

晓北 姜伟 著



- 走出书斋
火烧赵家楼
- 长辛店讲学
献身于劳工运动
- 省港大罢工
建筑“红色炮台”
- 赤都数载
人称“卓越的外交家”
- 转战千里
开辟鄂北苏区
- 坚贞不屈
血洒南京雨花台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烈士卷

邓 中 夏

晓北 姜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亚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中夏/晓北，姜伟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1

(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烈士卷)

ISBN 7-5006-1467-5

I. 邓…

Ⅰ. ①晓… ②姜…

Ⅱ. 邓中夏-生平事迹

Ⅳ. K827.6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75印张 3插页 88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40元

青年革命傳統
教育系列叢書

孫中山

目 录

第一章	风华正茂	1
第二章	劳工神圣	15
第三章	重燃烈火	36
第四章	指路明灯	43
第五章	挽救革命	68
第六章	不屈不挠	77
第七章	赤都岁月	87
第八章	转战苏区	98
第九章	忍辱负重	119
第十章	坚贞不屈	133

第一章 风华正茂

一九一七年的暑假过后，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又迎来了一批全国各地的学子，这其中有一位品学兼优的湖南青年，他就是邓中夏。当时的名字叫邓康。

这时正逢思想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蔡先生学贯中西，曾连中举人、进士，后又得翰林。他在德国留过学，广泛涉猎了近代西方的哲学、文学、美学和心理学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回到国内，在孙中山任总统的临时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积极引进西方的教育方针和制度，主张改革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他到北京大学上任后的第一讲，就号召学生与陈腐的名利观念决裂。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给北大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蔡元培还在全国聘请了一些著名的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任教。其中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以及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人。为了“兼收并蓄”，也有一定政治上很保守的人物被聘用。这使北京大学出现了“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冲破了封建思想的一统天下，进步思想得以发展和传播。

邓中夏就是在这种炽热的气氛下进入北京大学的，他投

考北大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课余时间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刊,他很崇拜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家,立志将来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番事业。在湖南高师读书时,恰逢封建专治的独裁者袁世凯被推翻,邓中夏为了表达他的欢快心情,曾给他的好友写了一首诗:

岳麓山观雪

瑞雪霏霏四海扬,亿兆苍生庆丰稔。
爱晚亭旁枫树白,云麓宫外梅花芳。
滚滚洞庭翻水浪,巍巍衡山换素装。
可怜奸贼反洪宪,日出霜消转瞬亡。

邓中夏来到北京大学后,他的求学为国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大进步教师多,这使他能经常听到他们的讲课,从中受到启发。邓中夏对进步教师很崇敬,对李大钊先生更是推崇,他常常向李大钊先生请教。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他开始迈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邓中夏进入北大不久,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和全中国都为之瞩目。北大的进步师生也从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李大钊先生是接受十月革命影响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开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欢呼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人类全体的新曙光”。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邓中夏立即投入搜集十月革命的资料,研究探讨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

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他的亲密朋友许宝驹回忆说：“中夏同志在初入北大时……常焦愁慨叹中国国家民族之将陷于沦亡，他这种焦急、愤怒的心情，在日常谈话中随时都表现出来的。约在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一八年初，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中夏忽然非常沉默寡言（他一向是爱讲话，议论风生的），除拼命搜集、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杂志外，经常陷入深思渊虑的状态。经过这个短短时期，他又活跃起来了。他向我不止一次地说：‘只有接受列宁、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从此，他总是兴致勃勃地、终日辛勤地进行革命工作，我此后永远没有再看见他有过愁苦的脸。”

一九一八年五月，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日本占领青岛，爆发了我国有大学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邓中夏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是他最初尝试组织进步的革命活动。

在邓中夏等人的组织下，北京大学召开学生大会，邀请了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代表参加。留日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坚决主张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也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的主张，会议开得激动人心，许多同学痛哭流涕。最后，全体学生决定与留日学生一致行动，去总统府请愿。

第二天上午，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两千多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直系军阀冯国璋被

迫接见了学生代表。他利用学生们缺乏斗争经验，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学生们听信了他的谎言，回校后第二天便宣告复课。谁知道，段政府根本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不但没有废除“协定”，而且不久又与日方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详细“办法”。因此，这次斗争没有取得胜利。

北京政府无耻的卖国行为和顽固态度，使邓中夏等进步学生得到了一次有益的教训。他们认识到，仅仅组织一两次示威游行是救不了国的，必须团结爱国学生，真正地组织起来，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这次游行示威后不久，在邓中夏等人的活动下，北京一部分爱国学生便组织了学生救国团，之后，又同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的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总部设在北京，邓中夏、许德珩等被推选为负责人。

由于军阀政府的严密统治，学生救国会一时难以公开活动，因此，学生救国会决定首先创办一个杂志，为反帝爱国宣传、为大规模爱国运动准备条件。该杂志定名为《国民》，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出版杂志的经费，除向同情学生的教授和社会人士募捐外，主要是由学生救国会成员分摊，凡提供经费者均为杂志社社员。

由邓中夏负责的杂志筹备工作进展很快，一九一九年一月，《国民》杂志创刊号即在北京出版发行。蔡元培为创刊号写了序言。李大钊、黄日葵等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由于杂志积极宣传爱国思想，评述时事政治，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特点，因此深受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邓中夏既是杂志的主要创办人，又是杂志的编辑。他常以“大壑”为笔名

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评述。他先后发表了《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国防军之成立》、《国防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数篇文章。这些文章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借助国内外报刊消息，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同时也揭露了军阀头子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

在编辑《国民》杂志的过程中，邓中夏感到杂志能够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宣传鼓动作用，但还不足以唤醒全国民众共同救国。中国的广大劳苦大众识字的很少，难以通过报刊了解国家大事，因此，普及平民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邓中夏等一些同学，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首先在北大办起“校役夜班”，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工友上文化课。后来又开始组织了著名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最初编为四个小组。在邓中夏等人的率领下，他们在北大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了数次演讲。邓中夏演讲的题目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其他团员也演讲了“勤劳与知识”、“如何求幸福”、“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等。他们的演讲受到广大劳动群众极为热烈的欢迎。有一天，“黄沙满天，不堪张目”，但演讲照常进行，“听讲者十分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讲演团后又在地安门外护国寺开辟了新的讲演场所。后来又发展为向城区和郊区的工人农民进行宣讲。邓中夏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了解了劳动人民，锻炼了宣传和组织才能，为他后来成为杰出的革命领袖准备了条件。

二

一九一九年初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邓中夏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这次运动是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为导火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十多个战胜国集会于巴黎，实质上是由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一次分赃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派代表到会。中国代表提出废弃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废除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等一系列要求。对于这些正义的、合理的要求，帝国主义大国竟无理否决。特别使人不能容忍的是，竟规定“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包括“支路”、“矿产”等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用牺牲中国利益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欲，使日本在山东的强盗行径合法化。

巴黎和会极大地激怒了中国民众。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的当天，邓中夏等人就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决定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五月三日晚举行全体师生大会。是时，作为《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领导人邓中夏等主持了会议。大会首先请北京新闻界人士报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委，接着由北大各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演说。他们的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感

人至深。有一位法科学生当场咬破中指，在撕下的衣襟上，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作出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日（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许，北京十三所高等学校的三千多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北京大学的队伍出发后，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和警察阻拦。邓中夏、黄日葵等学生代表与教育部的代表展开辩论，终于突破阻拦，急速向天安门进发。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后，随即举行会议。大会通过了由北大学生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开始游行。

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遭到中外军警的拦阻。大家议决先找卖国贼曹汝霖问罪。愤怒的人流向曹宅所在地赵家楼涌去。包围并冲进了曹宅。曹汝霖闻讯逃跑，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中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将尚未离开的学生及市民捕去。

邓中夏得知同学被捕，立即和李大钊先生及各学生社团负责人作了研究，一面将情况报告蔡校长，请其设法营救学生；一面决定立即把全校同学组织起来，准备斗争。当晚，北大学生便成立了干事会。邓中夏直接负责领导其中的文书股。文书股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负责编辑出版小报。

五月五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全部罢课。从这天起，邓中夏领导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奔赴各处演讲，演讲的题目有：“青岛交涉失败之原因”、“争回青岛”、“国民快醒”、“为什么要爱国”等等。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影响下，各校

也迅速组织了讲演团。

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选为该会总务干事，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五月下旬，邓中夏还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湖南学生介绍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要求支援。

六月一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接连下令，要求学生停止爱国行动，立即复课。同时，军警在北京街头逮捕了许多推销国货的爱国学生。这一切更激起广大学生的义愤。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邓中夏等又扩大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六月三日，北大等校学生两千人，高举讲演团大旗，分赴各处展开爱国宣传活动。学生们的爱国举动遭到军警的镇压，当天就抓去一百七十多人，六月四日，各校学生继续到街头发表演讲，被抓去七百多人，到六月五日上午，被捕的爱国学生已达一千多人。随着对爱国学生大规模的逮捕，人民的愤怒之火也越烧越旺，不但北京，而且全国各地的人民，均被北京军阀政府的行径激怒了，形成了一致的抗议行动。

为了支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六月五日，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其他纱厂工人，印刷、码头、铁路、电车、机器、海员、电灯、电话、自来水管的工人乃至清洁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在上海的影响下，天津和北京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大罢工。北京政府见此状况，惊恐万分，不得不在六月十日下令释放全国被捕学生，同时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卖国贼的职务。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从而使这

场空前的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作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对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了这场运动的先锋。作为李大钊同志的学生和战友，邓中夏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为这场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五四运动结束后，邓中夏并没有象有些青年学生那样认为大功已经告成，可以继续安心钻故纸堆了。他把注意力转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家怎样才能独立，人民如何翻身解放。为此，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一九一九年暑假，邓中夏邀约罗章龙、易克嶷、杨东莼等十几位同学，租下了北京东黄城根达教胡同四号的一个大院，作为他们学习的场所，同时兼作宿舍。邓中夏向大家建议，凡是住在这里的人，都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并共同制订学习公约和生活公约。公约规定由同学们凑钱，集体购买新出版的书籍，集体订阅进步报刊杂志；生活上一切自理。邓中夏给这个公寓取名“曦园”，意思是住在这里的年轻人，一定要象晨曦那样朝气蓬勃。大家在邓中夏的倡议下，学习抓得很紧，每天除了到北大听课外，每个星期至少举行两三次座谈会，有时谈

时事，谈政治，有时谈社会问题，有时也谈学习上的问题。同时坚持过集体生活，自己买米买菜，自己做饭、洗衣、打扫，一切生活自理。在劳动中，邓中夏总是拣重活和脏活做，例如背煤炭、升火炉和饭后洗碗，收拾厨房等。

在曦园居住期间，邓中夏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他一面研究中外历史，一面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从《新青年》、《晨报副刊》、《觉悟》、《每周评论》到《东方》、《今日》等，只要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后的资料，他都细心阅读，重要的还摘录在笔记本上，并经常剪报贴报，分别归类。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把学习心得用墨笔写在本上，字迹刚劲有力。

也是在曦园期间，邓中夏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参加了李大钊在北大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参加这个研究会的，除邓中夏外，还有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等人。不久，瞿秋白等人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参加这个研究会后，邓中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更高。他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去阅读马列书刊，并认真撰写读书笔记。下午，邓中夏通常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晚上再和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或讨论革命工作的有关问题，每天总要到午夜以后方能就寝。

五四运动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引起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重视。一九二〇年四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他们首先到了北京，会见了中国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并和李大钊讨论了建党问题，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

见陈独秀。一九二〇年八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〇年十月，在李大钊的发起和领导下，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是成员之一。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邓中夏一开始就积极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并介绍一些同志参加小组。

继上海、北京之后，湖南、湖北、广东、山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六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同志曾推选邓中夏到上海参加“一大”，但因当时邓中夏同志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最后才推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邓中夏虽然未能作为代表出席党的“一大”，但在李大钊的嘱托下，他赶到上海，参加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一九二〇年秋，邓中夏以优异成绩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这时北京大学有公费留学生出国的名额。有人要邓中夏出国留学，他认为“要做学问，自己在国内也可以做，不一定非要出国不可”，因而没有接受。中夏的父亲当时在北京政府任职，为中夏在农商部谋了一个职务，待遇很优厚，并代他接受了委任状。邓中夏坚决拒绝，要父亲把委任状退回。他对父亲说：“现在政治这样腐败，当官的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你叫我去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父子俩争吵了一番，不欢而散。此后邓中夏就和家庭完全断绝经济关系，决心做一个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靠党组织

发给微薄的生活津贴、稿费以及向朋友借贷，来维持生活。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邓中夏曾应聘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国文科担任教授，并到四川重庆，为夏令营讲学会讲学。所到之处，他都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批判封建教条、封建道德，号召知识分子投身到追求真理的洪流之中。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扩大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邓中夏和罗章龙在北京大学公开宣布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研究会成立的启事中，邓中夏和罗章龙明确宣告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启事刊出后，五四运动中的很多积极分子纷纷报名参加，多数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是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这些人大部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不到三个月，会员就由原来的十九人发展到六十三人。

研究会活动的方式很丰富。大家在各人研究的基础上，经常举行讨论会。先由会员一人就自己所研究的题目报告研究心得，然后由大家讨论。为便于大家深入研究自己所爱好的问题，研究会还按专题分组研究，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研究会还经常请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深的教授定期演讲。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人都先后作了专题讲演。不定期的辩论会也为会员